

# 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上）

王伟光 程恩富 胡乐明等\*



**【内容提要】**当前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当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微观基础、经济结构以及经济调节等方面的具体矛盾的现实表现。尽管西方国家反危机措施对于促使经济稳定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并没有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其他导致危机发生的各种具体矛盾，其缺陷及负面影响将在未来逐渐显现，西方国家的金融市场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多变。我国规避与防范金融和经济危机必须更加坚定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

**【关键词】**金融和经济危机 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作者王伟光（1950—），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北京 100732）；程恩富（1950—），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北京 100732）；胡乐明（1965—），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研究部主任、教授（北京 100732）。

2007年2月，美国次贷危机浮出水面。2007年8月，次贷危机开始向全球蔓延。进入2008年，危机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经济体传导到发展中经济体，从虚拟经济扩散到实体经济，西方主要经济体日益滑向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相互拖累的恶性循环。此次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冲击力度之强，世所罕见。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透析这场危机的本质、成因和影响，客观评析西方国家反危机措施的利弊，科学阐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正确把握这场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提出规避和防范类似危机的中国策略，对于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稳定发展，无疑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 一、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展开的表现，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因此，分析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与发展必须采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深入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当代发展，具体分析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现实表现。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课题主持人为王伟光，课题组组长为程恩富、胡乐明，课题组副组长为余斌，课题组成员有杨斌、杨静、曾宪奎、王佳菲、牛正科、李洪江等。

## 1. 商品内在二重性矛盾蕴含危机发生的可能

商品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细胞和最普遍的存在,商品和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体现并蕴含了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sup>①</sup>。因此,从商品及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和本质关系分析入手,可以发现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般要素与抽象形式。

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使用价值与价值二者既相互依赖、互为条件,又相互排斥、互相背离。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以及决定这一矛盾的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的发展导致了货币的产生,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愈益分离,商品与货币愈益对立。

货币的产生使得商品交换由直接物物交换发展成为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过程,使得一个完整交换过程的买和卖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分离,从而导致危机第一种形式的可能性。也就是,“如果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买和卖的分离中”<sup>②</sup>。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不仅作为流通手段,而且具有支付手段功能。货币支付手段功能使得商品交换的当事人演变为债权人和债务人,使得商品生产者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支付链条和债务链条。在这一链条上,如果一个债务人不能按时履行支付义务,整个链条上的一系列债务人也就随之不能偿债,从而形成危机第二种形式的可能性。也就是,“如果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刻分别起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的作用,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这两个时刻的分离中”<sup>③</sup>。

由商品和商品交换内在矛盾发展起来的危机两种形式的可能性,只是经济危机的“最一般的表现”,是现实危机的抽象形式,潜伏于一切商品生产之中。随着商品生产转变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经济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得到进一步发展并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一开始就是发达的商品生产,发达的商品生产使得商品内在矛盾的各种形式得到更加充分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产业资本必须按照一定比例分成相应部分,同时并存于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态,并相继地经过循环的三个阶段。否则,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就会发生交替的中断。同时,随着信用制度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货币资本逐渐独立发展,形成借贷资本、银行资本以及虚拟资本,不仅增加了资本运动的环节和层次,也日益与产业资本相背离,商品内在二重性矛盾进一步发展为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对立。尤其是,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买卖的分离、生产与流通的分离日趋严重,处于商品资本阶段、处于流通时间内的社会资本也会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加,从而导致信用规模膨胀和信用期限延长。因此,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作为资本的流通过程或再生产过程,包含着不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危机的可能性,包含着不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危机的抽象形式。

## 2.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危机发生的必然

危机的可能性转变为必然现实,需要整整一系列的关系。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基本矛盾。因此,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当代发展分析入手,可以发现,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现实要素与表现形式。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具体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和累积,必然会使得价值与使用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商品与货币的分离和对立具有不可调和的对抗性质,使得资本

① 王伟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认识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和原因》,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2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8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87页。

主义商品生产正常运行所需要的一系列连续性、并存性和均衡性关系难以得到满足,使得社会资本再生产所需要的各种比例关系经常遭到破坏,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必然性。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周期性激化的必然结果。

毫无疑问,马克思的分析依然正确。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便不可避免。此次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依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发展的必然表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不断扩展并日趋激化。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各类企业和资本不断突破部门和领土的边界向各个产业和世界各地扩张并相互合作,生产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以寻求相应的位置进行最佳的资源配置,生产与经济的社会化、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资本走向进一步的积聚和集中,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资本相互渗透与融合,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全球垄断寡头,即产量超过中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巨大型跨国公司,生产资料和金融财富更大规模地向少数人和少数国家集中。这样,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逐步扩展为经济的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的矛盾<sup>①</sup>。可以说,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便是这一矛盾日趋尖锐的必然产物。

更为重要的是,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扩展的一个突出方面是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和全球掠夺。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为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和病态膨胀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为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和全球掠夺提供了重要的杠杆与平台,新自由主义则成为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及其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正是在这“三驾马车”的拉动之下,全球金融资本急剧增长并成为经济乃至政治的主宰<sup>②</sup>。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全球金融资产价值1980年只有12万亿美元,与当年全球GDP规模基本相当;1993年达到53万亿美元,为当年全球GDP的2倍;2003年增长到124万亿美元,超过当年全球GDP的3倍;2007年,全球金融体系内的商业银行资产余额、未偿债券余额和股票市值合计达到了230万亿美元,为当年全球GDP的4.21倍<sup>③</sup>。现代金融资本具有高度的逐利性,极易导致资本主义各国生产与经济的盲目扩张;现代金融资本具有高度的变动性,极易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生产与经济的不稳定;现代金融资本具有高度的虚拟性,极易促成资本主义各国生产与经济的泡沫膨胀。因此,金融资本由服务于产业资本向主宰产业资本的异化必然导致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展到一个新的尖锐高度,加剧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紊乱,引发资本主义更加频繁的首先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 3. 当代资本主义各种矛盾促成危机发生的现实

“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两次绝对一样的经济危机”。每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也都是资本主义所处时代各种具体矛盾和具体问题的综合反映。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在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同时,由微观基础、经济结构以及经济调节等方面的具体矛盾和问题共同导致的结果。

从微观基础分析,此次危机是美国式公司治理模式的缺陷的具体反映。首先,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造成公司经营的短期行为。美国式公司治理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公司股权集中度低,股权结构较为分散,股票流动性较强。资料显示,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雷曼、贝尔斯登等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平均股权集中度仅为15.6%,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的只有摩根士丹利一家,高盛

① 程恩富:《当前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与全球治理》,载《管理学报》2009年第1期。

② 何秉孟:《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12期。

③ 转引自朱民等著:《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集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仅为 1.74%。在过度分散型股权结构下,股东的“理智的冷漠”和“搭便车倾向”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无人愿意行使监督权,从而导致股权分散下的“内部人控制”格局。同时,由于股东判断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主要标准是盈利率和股票价格的高低,并以短期投资收益最大化为目标,这就使公司经营在股东追求短期回报和高收益率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于目前或近期利润。尤其是,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极易导致上市公司受到极不稳定的所谓机构投资者,即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对冲基金等金融资本的冲击和控制,顺从股票价格最大化的短期主义逻辑。其次,失当的薪酬体系“激励”管理层的冒险行为。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股票期权计划的广泛实施,行使股票期权的收入逐渐成为美国公司管理层薪酬的主要来源,并导致其收入达到令人惊叹的水平。资料显示,全美前 100 名高级企业主管的平均年收入 30 年前为 130 万美元,今天则为 3750 万美元。失当的薪酬激励使美国公司高管根本无暇注重公司长期发展,而是更多追逐短期效益,过分地关注公司股票价格,甚至不惜突破道德底线,进行各种放大效应的套利行为。实证研究发现,美国许多公司在推行股票期权计划的同时,存在着明显的市场操纵行为,股票期权计划正在诱发企业管理者新的道德风险,在这些新的道德风险的冲击下,一个个庞然大物在瞬间轰然倒下。

从经济结构分析,此次危机是虚拟经济日益膨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日益对立的直接结果。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金融资本由服务于产业资本异化为主宰产业资本,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日益脱节和对立。2007 年,全球实体经济 10 万多亿美元, GDP 近 54 万亿美元,全球衍生金融产品市值为 681 万亿美元,与全球 GDP 之比为 13:1;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值约为 340 万亿美元, GDP 近 14 万亿美元,二者之比高达 25:1<sup>①</sup>。虚拟经济的病态发展在满足金融资本逐利本性的同时,由此导致的巨大的虚假需求也会诱导实体经济的盲目扩张,推动一切国家出口和进口膨胀、生产过剩。一旦虚拟经济的泡沫破灭,必然首先引发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进而引起全面的经济危机。此次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与 1991 年的日本经济危机、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一样,直接诱因都是房地产业及相关金融产业过度膨胀之后的虚拟经济泡沫破灭。

从分配和消费角度分析,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还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贫富差距不断加大。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的 30 年,美国普通劳动者家庭的收入没有明显增加,而占人口 0.1%的富有者的收入增长了 4 倍,占人口 0.01%的最富有者家庭财富增加了 7 倍;从 2000 年到 2006 年,美国 1.5 万个高收入家庭的年收入从 1500 万美元增加至 3000 万美元,而占美国劳动力 70%的普通员工家庭的年收入仅从 25800 美元增加到 26350 美元;目前最富有阶层所占据的国民收入比重高于 1929 年美国经济衰退以来的任何时期。为缓解生产无限扩张趋势与广大劳动者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满足金融垄断资本的逐利欲望,美国逐步形成了一种“债务经济模式”:普通民众依靠借贷维持正常消费,支撑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然而,由债务推动的透支性经济增长终究是不可持续的,由借贷消费所掩盖的资本主义深层次结构矛盾必然转化为危机现象。

从经济调节分析,此次危机是政府监管不力、市场和国家调节双失灵的表现。适应金融资本自由流动和贪婪逐利的需要,美国 1980 年通过的《存款机构放松管制与货币控制法》、1982 年通过的《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1995 年通过的《1995 年金融服务竞争法》、1999 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2002 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管制放松法案》等,一步步放松了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与规制。这样,诸如次级贷款和由按揭所支撑的证券以及其他所谓金融创新产品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涌入投机性业务领域,经济运行的风险不断加大,市场调节的

① 李慎明:《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前景及应对建议》,见李慎明主编:《美元霸权与经济危机——今天对今天经济危机的剖析》(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7页。

失灵必然发生。尤其是，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的巨大规模和场外交易方式已经使得基础产品的风险以极低的成本和极快的速度传递给全球金融市场的所有参与者，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加大和复杂化，而以功能为基础的分业监管以及以主权为基础的分割监管却难以应对全球性的市场失灵和系统性风险。因此，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双失灵的结果，必然使得美国的次贷危机发生并演变为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 二、西方国家反危机措施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

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西方国家纷纷采取了包括金融稳定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各种产业促进政策在内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尽管西方国家反危机措施对于恢复市场信心和促使经济稳定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并没有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他导致危机发生的各种具体矛盾，其缺陷及负面影响将在未来逐渐凸显。

### 1. 西方国家反危机措施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

2007年4月，伴随着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次贷危机开始在美国逐步显现。2007年9月18日，美联储降息0.5个百分点，从此美国进入“降息周期”。随着次贷危机的蔓延，2008年2月7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168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正式拉开了西方主要经济体应对金融危机的序幕。2008年3月11日，美联储、欧洲央行等5家西方主要央行联合宣布，将同时向金融系统注入资金。2008年7月13日，美联储等机构决定分别救助房利美和房地美，并承诺在必要情况下购入两公司股份。2008年7月26日，美国参议院批准总额达3000亿美元的住房援助议案，同时授权财政部无限度提高“两房”贷款信用额度，同年9月7日，美国联邦政府决定直接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2008年9月16日，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等西方主要央行再次同时向金融系统注入资金，美国政府同时接管全球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2008年9月19日，日本银行再次向短期金融市场注资3万亿日元，欧洲央行以及英国和瑞士的中央银行共向金融系统注资900亿美元。2008年10月3日，布什政府提出的7000亿金融救援计划正式在两院通过。2008年10月8日，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等几大西方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联合降息0.5个百分点。

随着金融危机逐步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西方主要经济体反危机措施的覆盖面也从金融领域逐渐向实体经济领域扩展。2008年10月30日，日本政府公布约273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美联储于2008年11月25日宣布投入8000亿美元，用于解冻消费信贷市场、住房抵押信贷以及小企业信贷市场。2008年11月26日，欧盟出台了总额为20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方案。2008年12月4日，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瑞典央行进一步降低利率，分别降低0.75、1和1.75个百分点。2008年12月16日，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0—0.25%的历史低点。2009年2月17日，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签署了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3月3日，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共同公布了总额为2000亿美元的刺激消费信贷计划。2009年3月5日，英国央行将基准利率从1%降至0.5%的历史低点。2009年4月10日，日本政府颁布了总额为56.8万亿日元的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新方案。2009年5月7日，继美国、英国政府将利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之后，欧洲央行宣布将欧元区主导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1%。2009年7月2日欧洲央行宣布，将启动总额为600亿欧元资产担保债券购买计划，开始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sup>①</sup>。

<sup>①</sup> 以上资料主要来源于《美国次贷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大事记》，中国经济网2009年9月14日。

上述分析表明,西方主要经济体反危机措施的实施经历了从金融领域逐步向非金融领域扩散的过程,反危机措施的着力点也经历了从挽救金融机构、防止金融形势继续恶化到阻止经济继续下滑、刺激经济复苏的演变。面对不断蔓延和深化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美英等西方主要国家被迫逐步放弃了奉行了30年之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转而采取了加大政府开支、扩大基础建设投入等政府干预政策。因此,此次危机绝不是“复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机会”,而是正式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的彻底破产。

## 2. 西方国家反危机措施预示着凯恩斯主义的回潮

西方国家采取的反危机措施包括金融救助和稳定政策、货币扩张政策、财政刺激政策以及产业促进和保护政策等一系列凯恩斯主义式的干预政策,预示着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回潮。

金融救助和稳定政策。危机发生以后,金融机构损失惨重,不得不低价抛售金融资产,紧缩信贷。为挽救金融机构日益恶化的资产负债表,恢复市场信心,西方国家采取了救助金融机构、稳定金融市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1)政府出资购买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阻止金融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2008年10月,布什政府提出的总额高达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主要是用于购买金融机构的问题资产。(2)各国央行通过各种形式向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缓解信贷紧缩的压力。(3)政府直接向问题金融机构注入资本金,实施“暂时国有化”。为挽救陷入破产边缘的金融机构,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国家直接动用财政资金向问题金融机构进行注资或提供债务担保,以此换取被救助金融机构的优先股或普通股甚至控股权,并对被救助金融机构高管薪酬和信贷投放等经营活动进行干预。通过上述措施,美国对房利美和房地美、花旗集团,英国对诺森罗克银行、莱斯TSB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德国对德国住房抵押贷款银行等金融机构实施了“暂时国有化”。(4)改革金融体系,加强金融监管。2008年3月,美国出台了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计划。该计划提出,扩大美联储权限,除监管商业银行外,还将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整合银行监管权,新建监管机构如“金融审慎管理局”、“商业行为监管局”、“抵押贷款创设委员会”和“全国保险管理局”等,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危机期间,西方主要国家普遍加强了对各类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监管,高度关注被监管对象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以及市场风险的敏感性等结构性指标,并调整会计准则以更准确地反映金融机构的风险水平。此外,为应对危机的全球蔓延,世界主要国家还就国际金融组织和金融体系的改革,以及具有全球性、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的监管机制,达成了多项共识。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为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以促进信贷,缓解流动性紧缩的压力,西方主要国家普遍采取了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给等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措施。(1)大幅密集降息。自2007年9月18日—2008年12月16日,15个月的时间里美联储10次打出了降息牌,将基准利率大幅下调累计达500个基点,由5.25%降至0.25%,并宣布将联邦基准利率长期保持在0—0.25%之间;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自2008年10月之后连续6次大幅降息,将基准利率从5%降至0.5%,欧洲央行将欧元区主导利率累计下调325个基点至2009年5月的1%;日本央行于2008年10月31日将基准利率降低到0.3%,之后进一步将其降低至0.1%的水平。同时,西方主要经济体的中央银行注重联合采取降息行动。例如,2008年10月8日,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以及加拿大、瑞士和瑞典等国的央行均宣布将基准利率降低0.5个百分点。(2)通过金融工具创新和购买金融资产等方式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等西方国家央行除通过定期拍卖贷款(TAF)、重要交易商信用贷款(PDCF)、限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TSLF)、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融资工具(AMLF)等创新性的金融工具持续不断地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同时通过购买国债和机构债等

金融资产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1月，日本银行宣布考虑购买2万亿日元的商业票据；2009年3月，美联储宣布逐渐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进一步购入75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相关证券，追加购买1000亿美元的房贷公司债券；英格兰银行于2009年3月11日决定购买20亿英镑的国债，3月23日，又决定购买750亿英镑的公司债券；2009年5月，欧洲央行宣布将购买总额达600亿欧元的资产担保债券。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危机发生以后，为了稳定就业，阻止经济严重下滑，刺激其复苏，西方主要国家实施了包括减税、增加政府投资、财政补贴消费等内容的一系列财政刺激政策措施。（1）大规模减税以刺激消费和投资。美国继布什政府出台1680亿美元减税方案之后，2009年2月，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总额达到787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中，又有35%的金额用于减税；2008年11月24日，英国宣布的200亿英镑经济刺激方案将增值税率由17.5%下调至15%；日本在住宅税、土地税、汽车税等方面减税总额达1.07万亿日元，其中，国税减征6900亿日元，地方税减征3800亿日元；欧盟的减税范围主要包括降低增值税、消费税、中低收入者的税务负担、减少企业主为其职工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等。（2）增加政府投资以拉动市场需求。美国奥巴马政府的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的大约65%用于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和新能源技术方面投资；德国计划投入500亿欧元，主要用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法国出台了265亿欧元的振兴计划，111亿欧元用于公共投资。（3）财政补贴消费以扩大内需。危机期间，欧洲有10多个国家实行补贴汽车“以旧换新”，意大利政府对购买电动汽车、混合燃料汽车和小排量汽车给予环境奖金和汽车报废退税，合计可高达5000欧元；德国对回收9年以上车龄的旧车并购买新型节能汽车给予2500欧元的“以旧换新”补贴，总额达50亿欧元；法国、西班牙、荷兰、奥地利等国也对“以旧换新”购买新车给予1000—1750欧元不等的补贴；美国计划斥资40亿—60亿美元，推广汽车“以旧换新”。

产业促进和保护政策。为了占领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维持经济霸权，保护本国企业和就业，制约其他国家发展，西方主要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产业促进和产业保护政策。（1）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美国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宽带计划”获得政府投资72亿美元，医疗信息技术研发获得政府投资190亿美元；欧盟反危机措施也注重提高产业研发、创新的标准与要求，以增强欧盟全球竞争力与长期发展潜力；2009年3月，日本政府制定了一项为期3年的信息技术紧急计划，在未来3年内官民共同增加投资3万亿日元，着重加强医疗IT环境、培养IT人才、推动电子行政等IT技术应用。（2）加大新能源和环保投资。美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约有500亿美元投入绿色能源产业；欧盟2009年3月决定，在2013年之前投资1050亿欧元用于“绿色经济”的发展；日本为配合第四次经济刺激计划于2009年4月推出了新增长策略，发展方向为环保型汽车、电力汽车、低碳排放、医疗与护理、太阳能发电等。（3）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领域投资。西方主要国家根据本身基础设施的特点，普遍相应加大了基础设施投资。例如，美国在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拿出110亿美元用于提升美国电网。同时，西方主要国家的反危机措施也十分注重增加教育、医疗、公共住房等公共领域的投资。美国在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有1059亿美元用于教育投资，比重高达13.5%。（4）扶持中小企业，保护国内市场。日本反危机措施特别强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为中小企业减轻负担；欧盟反危机措施更是强调经济刺激方案向中小企业倾斜。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虽然承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实际上却加强了对国内市场的保护，贸易保护主义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抬头。世贸组织（WTO）秘书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10月28日，WTO成员共发起171起反倾销调查，其中第三季度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量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3%以上；WTO预计2009年全球反倾销调查数量将达230—250起，超出2008年全年的212起。



### 3. 西方国家反危机措施未能消除危机的根源

实践已经证明,凯恩斯主义式国家干预政策确实有助于经济运行中各种矛盾的缓解,但是它自身同样存在严重的缺陷,而且无法消除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爆发的根源和矛盾。

首先,西方主要国家采取的反危机措施确实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1)反危机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金融市场稳定。比如西方主要国家通过政府注资金融机构、购买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向金融机构提供贷款以及加强金融监管和国际金融合作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在短期内缓解了金融机构在资金方面的困难,避免了更多金融机构破产倒闭,避免了市场信心的彻底崩溃,在稳定各国金融市场和全球金融体系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2)实体经济下滑趋势有望得到遏制。2009年第二季度之后,西方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运行相继止跌,并在下半年出现了经济触底或反弹迹象。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第三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了3.5%,为连续四个季度下滑后首次正增长;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第三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增长0.4%,结束了连续五个季度的经济萎缩势头。(3)经济结构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良性调整。西方国家反危机措施试图加强金融监管和金融体系改革,有望使得虚拟经济的畸形膨胀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注重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领域的投资以及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可以使得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和发展基础得到一定程度的完善;重视增加新技术、新兴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有利于孕育出新的支柱产业,占领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此外,西方国家采取的提供再就业培训、提供社会领域的临时工作岗位以及向贫困家庭发放困难补助等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有助于避免更加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发生。

但是,西方国家反危机措施的缺陷及其负面影响同样不容忽视。(1)金融救助和稳定政策难以有效提高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防范风险的能力。从目前的相关措施来看,西方国家尚未有效处置巨额有毒的金融衍生产品及其他有毒的金融资产,金融机构杠杆化程度依然较高,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质量并未得到真正改善。同时,西方主要国家也没有拿出有效解决金融监管问题的实质性方案。尤其是,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方面来看,虽然各个国家对此有着较为一致的认识,但是却很难拿出一个可操作的方案来协调不同国家的利益关系进而实现国际合作。(2)扩张性货币政策难以拉动经济复苏却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抬头。目前,西方主要国家的利率政策已经遭遇到了“流动性陷阱”:利率几乎降至零,经济却依然萎靡不振。“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尽管向金融体系注入了巨量基础货币,经济体系的货币供给却没有明显增加,金融机构的信贷紧缩问题依然严重。同时,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导致西方主要经济体潜伏着通货膨胀的风险。如果未来通货膨胀的发生早于经济复苏,这些国家的政府将面对“滞胀”的两难困境,无论优先处理哪个问题,都会对经济运行不利;即使通货膨胀的发生晚于经济复苏,但是一旦通货膨胀发生,那么治理通货膨胀也会严重影响经济持续增长,从而可能会使经济重新陷入低迷。(3)扩张性财政政策作用有限且导致巨额财政赤字。政府减税政策在经济低迷、预期悲观的情况下难以有效刺激消费和投资;政府投资的增加由于“挤出效应”的存在不利于私人投资的增加。同时,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已经导致了巨额的政府财政赤字。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8年12月公布的数据,日本政府债务总额高达591万亿日元,超过了日本2008年的GDP,如果将地方政府的债务包括在内,日本政府系统的负债总额与GDP的比例高达180%。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美国2009年财政赤字高达1.417万亿美元,2010年将达到1.5万亿美元。财政赤字长期维持在高水平,有可能会引发国家信用危机,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危害。如果政府在未来通过财政盈余的方式逐步消除财政赤字,则可能会由于紧缩性财政政策而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4)各种产业发展政策的效果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新能源、环境保护



等新兴行业的发展均依赖技术标准、消费者偏好、法律体系、国际合作等方面出现实质性的变革，短期内商业前景并不乐观<sup>①</sup>。另一方面，各种贸易保护政策已经导致严重的贸易摩擦，国际贸易环境因此而急剧恶化。

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反危机措施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不能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各种具体矛盾。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的破产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回潮，改变的只是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或治理体制，并没有丝毫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周期性激化的结果，资本主义在其自身范围内无法克服危机，它克服危机的办法不过是“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sup>②</sup>。与历次重大危机时期一样，西方国家在本次危机期间也对那些面临破产的重要企业实施了“国有化”，并大规模地干预经济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政府将“无限期地直接管理经济”，更不意味着西方国家将改变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一旦渡过危机，它们又会重新将更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并放松某些应急的政府干预措施。因而，尽管西方国家的反危机措施能够在一段时间内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却不能根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具体表现。相反，鼓励企业之间的兼并以及“再私有化”等措施，将在一定程度上加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强化金融垄断资本所主导的掠夺性经济体制，加大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从而酝酿未来更大规模、更为猛烈的危机。

### 三、科学把握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走势与影响

尽管世界范围的反危机措施使得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似乎趋向稳定，但是危机的根源并未消除，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危机的走势和影响还有待观测。可以确定的是，此次危机既是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又是一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危机和发展方式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它必将导致世界格局和发展进程发生重大变化和转折。

#### 1. 西方国家的金融市场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多变

正如不能仅仅从现象层面、操作层面分析此次危机的起因一样，分析预测此次危机的走势也不能仅仅停留于现象指标和技术层面。科学把握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走势，既要关注短期、技术指标的变化，更要关注长期、深层因素的影响；既要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般规律，更要把握此次危机的特殊表现。

经过巨额注资和多方联合干预，国际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虽有所降低，但是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目前依然混乱而脆弱。首先，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违约率、撇账率还在上升，资产质量继续恶化，问题银行数量仍在增加。2009年第四季度，美国银行贷款违约率为7.17%，连续十二个季度呈现上升趋势；撇账率为2.93%，连续十四个季度呈现上升趋势；问题银行数量跃增27%，数目达到了702家，创下199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截至2010年4月10日，美国破产银行总数在2009年140家的基础上又增42家。其次，货币金融机构对其他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融资增长率不断下降，信贷继续停滞甚至萎缩。2010年2月24日，美国的银行信贷余额为8.89万亿美元，比1月平均值下降1.3%；2010年1月末，日本的银行信贷余额为419万亿日元，同比下降2.0%。再次，西方主要国家房地产市场再度下挫，金融机构房贷风险加大。2010年1月份，美国现房价格环比下降3.4%，

① 何帆：《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及其效果评述》，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4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8页。

新房价格环比下降 5.6%，现房销量环比下降 7.2%，均为连续两个月下降；新房销量环比下降 11.2%，连续三个月下降；2 月份，英国房价环比下降 1%，为十个月以来首次下降<sup>①</sup>。据统计，2010 年美国将有超过 5000 亿美元的商业地产贷款到期，若美国商业地产价格持续下滑，势必导致更多美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出现严重亏损甚至倒闭。更为严重的是，主权债务危机加剧，金融市场动荡重现。为应对金融危机，西方主要国家积累了巨额财政赤字，公共债务水平急剧攀升。据联合国 2010 年 1 月统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投入的财政救援资金已达 26330 亿美元。研究显示，目前美国国债占 GDP 的比例为 87.4%，2010 年将升至 97.5%；英国国债总额占 GDP 的比重将由 2009 年的 75.3% 升至 2010 年的 89.3%；法国国债占 GDP 比重将由 73.9% 升至 2010 年的 77.5%；希腊公债占 GDP 比重将从 2009 年的 113% 升至 2010 年的 130%；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例将从 2009 年的 218% 升至 2010 年的 227%。迪拜债务危机和希腊债务危机引发股市、汇市、债市、期市等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表明，不断扩大的公共债务规模极易导致主权债务危机并引发新一轮的金融动荡，使得西方国家陷入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相互拖累的恶性循环。

因此，西方国家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依然存在恶化的风险，彻底摆脱金融危机、实现全球范围金融市场正常化更是路途遥远。首先，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及其监管机制的改革进展缓慢。此次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式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重新构建相对完善的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已成为实现金融体系正常化的重要微观基础。然而，旨在强化投资者权益保护和董事会责任从而堵塞公司治理漏洞的各项公司治理改革法案，却遭到了美国商会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中代表华尔街高管和金融精英利益人士的普遍抵制。同时，完善全球金融体系的监管机制，一方面，需要各国完善自身的监管体系，另一方面，需要各国共同建立一个更为有效的全球协调监管体系，以强化金融机构的规模监管、跨国操作监管以及金融衍生品创新的动态评估和监管。然而，各国完善内部金融市场监管体系尚存在许多困难，能否尽快制定出能够为各国普遍接受的规章制度，并按照 G20 匹兹堡峰会所确定的在 2012 年将其全部付诸实施，无疑更是充满了巨大的挑战。其次，金融资本主导的畸形经济结构的调整困难重重。实现全球范围金融市场的正常化，必须终结金融资本的畸形膨胀和全球扩张，扭转金融资本主宰产业资本的异化倾向，“再平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结构关系。然而，忙于金融“救火”的西方各国政府目前基本无暇顾及金融机构的“瘦身”和资产负债表的调整，它们是否愿意与能够剔除和挤掉巨额金融有毒资产和泡沫资产，尚存许多疑问。更为困难的是，经过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经济金融化、金融泡沫化运动，西方资本主义已经步入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美欧等国已经步入了严重依赖经济增长和金融泡沫的“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逆转这一趋势，无疑需要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数据显示，华尔街金融机构 2009 年较为“漂亮”的业绩表现仍然主要依赖于庞大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再次，以美元为中心的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改革步履维艰。如果不对当前货币金融体系进行根本性改革，造成金融危机的制度性缺陷就不会消除，也不可能实现全球范围内金融市场的正常化。然而，尽管美元作为衡量财富的世界储备货币与美国主权货币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世界各国也提出了许多创建新的世界储备货币的方案，但是，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必将极力捍卫美元的霸主地位，试图挑战美元地位的欧元由于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而尽显颓势，目前世界没有任何一种储备工具可以切实地评估、度量、交换和承载商品与服务的真正价值。同样，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也将是一个世界各国实力角逐的漫长过程。西方主要国家自利的改革主张和议程设定仍然占据压倒性优势，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国际金融体系合理化、正常化的要求明显缺乏足够重视，IMF 份额改革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

<sup>①</sup> 《世界经济继续缓慢复苏演变前景仍然错综复杂》，金融界网站：2010年3月29日。

并未改变美欧等成员国的主导地位，世界货币金融体系的合理化改革任重道远。

金融是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核心。没有一个正常运转的金融市场，西方国家就不可能真正彻底摆脱金融危机，也不可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目前西方国家刺激经济复苏与增长的各项政策就根本而言大都是低效甚至无效的，也是难以持久的。尽管西方主要经济体从2009年下半年先后转入正增长，但这只是依赖短期的、特殊的政策作用取得的“临时性增长”。数据显示，西方国家的失业率仍处历史高位且呈继续攀升态势。2010年2月，欧元区16国的失业率为10%，比1月份上升了0.1个百分点，创下了1998年8月以来的最高纪录；欧盟27国的失业率为9.6%，同样比1月份上升了0.1个百分点，创下了2000年1月以来的新高；美国2010年3月的失业率则继续维持在9.7%的高位。另外，根据总部位于巴黎的信贷保险公司Euler Hermes的调查显示，2010年德国企业破产数量将增长11%，达到创纪录的3.89万家；2010年西欧国家企业破产数将平均增长8.7%。这表明，断言经济危机已经过去显然为时尚早。西方国家经济目前的“弱势反弹”犹如“依赖特殊药物的重症病人”，没有了刺激政策的“生命保障”，随时便可能重回衰退。问题恰恰在于，西方主要经济体如今正处于进退两难的政策境地：退出经济刺激政策，必然导致经济反弹势头逆转；继续实施刺激政策，必然加剧日趋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欲摆脱两难境地，或许只能寄希望于新一轮金融泡沫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实体经济早日实现“自主性增长”。

实现经济自主性增长，需要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国际贸易以及主导产业等方面的振兴与持续增长。在消费需求方面，尽管改变居民负债消费模式不符合西方国家金融资本的利益，但是，修补家庭资产负债表、提高私人储蓄率却已成为美欧等国消费者的普遍选择。数据显示，美国2010年3月份正式登记的个人破产申请多达15.8万件，平均每天6900件，同比增加了19%，环比增加了35%，创下了2005年10月以来的单月最高纪录。显然，近期内期望美欧等国居民消费重回负债模式、实现强劲回升是不现实的。麦肯锡公司的研究显示，美国家庭负债与个人可支配收入比率每下调一个百分点，将导致总需求减少1000亿美元左右；美国家庭储蓄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也将导致总需求减少1000亿美元左右。鉴于消费支出对于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70%、美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份额超过20%，可以肯定，美国消费者行为的变化必然严重抑制西方国家实体经济的复苏。在投资需求方面，尽管去库存化步伐有所减慢，但是美欧等国产能利用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难以期望投资支出在近期大规模增长。2010年2月，美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和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2.7%和69%，分别低于长期趋势（1972年1月—2009年9月）8.0个和10.3个百分点。欧盟国家和日本的产能利用率也不乐观，同样远低于长期趋势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是历次经济复苏的基础。西方国家目前产能过剩严重，加之信贷市场疲软，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增长难以想象。在国际贸易方面，尽管世界各国普遍呼吁贸易自由以共同应对危机，但是贸易保护主义却不可阻遏地泛滥开来。迫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压力，欧美等西方主要经济体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以解决“全球经济失衡”为借口，不断采取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保护本国企业和本国市场，保护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保护的对象不断增加，保护的手段日趋多样，导致全球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急剧升温，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和贸易增长。2010年3月26日，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10年全球贸易量有望增长9.5%，但恢复到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尚需两到三年。在主导产业方面，尽管目前人们对于新能源、低碳经济等产业的期望甚高，但它们能否成为带动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新的主导产业尚存许多疑问。一方面，促进新能源产业降低成本、提升竞争能力的技术创新进展缓慢，同时发展新能源经济必然遭受传统能源产业利益集团的抵制和阻挠。另一方面，制定更加严格的减排规则，提高化石能源的消费成本，改变化石能源与清洁能源的成本比价，无疑更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国际政治博弈和经济博

奔过程。上述分析表明,西方国家实体经济真正实现自主性增长需要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可以预期,此次经济衰退的持续时间将会超过以往半个世纪之中的任何一次衰退”<sup>①</sup>。

当然,此次危机终将过去。然而,尽管当代资本主义通过自身调整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社会矛盾调适能力,尽管西方国家经过历次危机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应对危机经验,尽管全球化背景下反危机行动可以实现空前的国际合作,但是各种危机干预和调节措施在降低危机破坏程度和缩短危机时间的同时,也降低了危机对于各种矛盾的强制平衡作用,即使能够暂时实现金融市场和经济运行的稳定与复苏,也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加频繁、更加猛烈地爆发。

## 2. 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

此次危机的爆发,并集中于金融经济领域,但又不限于金融经济领域,涉及能源环境、发展模式乃至价值理念等各个领域的矛盾和问题,既是一场深度的金融经济危机,也是一场严重的思想体系危机、发展方式危机。

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危机不仅宣告了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失败,也同时宣告了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破产。秉承自由主义的一贯理念,新自由主义更加信奉和推崇私有产权、市场秩序和个人自由,竭力鼓吹“个人是自身福利最好的判断者”、“一切财产应该属于私人和个人”、“市场力量可以自动实现社会繁荣”。此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作为风行了近30年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受到了愈益广泛的质疑和批判。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意识形态,完全服务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操纵金融市场剥夺世界各国人民的需要,必须从价值、所有权和民主自由等方面揭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和反科学性,甚至新自由主义的急先锋们也在“忏悔”自己的错误<sup>②</sup>。更进一步地说,此次危机更加促使人们重新深刻审视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普世价值观、人权观、民主观,质疑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与正当性。长期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大都宣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战胜的“千年王国”;资本主义之前存在历史,资本主义之后再无历史。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历史的终结”的论调甚嚣尘上,资本主义崇拜成为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霸权”。然而,据英国广播公司2009年6月19日—10月13日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7个国家的2.9万名受访者中,只有11%的人认为资本主义运转良好,89%的人对资本主义表示不满。其中,平均23%的人认为资本主义有着致命缺陷,需要一个全新的体系来代替它,法国、墨西哥、巴西、意大利持有此种观点的比例分别高达43%、38%、35%、29%。这表明,危机发生之后,人们不仅在讨论告别亚当·斯密,也在讨论告别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迷梦正在破灭。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却在世界范围内再度复兴,“人们不仅重新找到马克思,而且重新发现社会主义优越传统”。此次危机爆发以来,马克思及其学说频繁地出现于西方主流媒体,《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德国、美国和英国等地持续热销,不仅凸显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严重危机,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活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认,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矛盾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依然正确,早在100多年前就被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引发的种种灾难已经全部显现,“马克思极有可能成为21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甚至两年之前还在极力攻击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灾祸之一的罗马教皇,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正确批判。

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榜样模式”的危机。1989年之后,西方主流学者普遍认为,世界只剩下两

① 理查德·波斯纳:《资本主义的失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

② 郑萍:《日本新自由主义急先锋的忏悔录》,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12期。

大超级力量：美国和欧洲；竞争只存在于两种资本主义模式之间：美英模式和莱茵模式。然而，此次危机的爆发却同时宣告了资本主义两大“榜样模式”的失败。一般认为，美英模式比较强调充分发挥以财产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原则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尽量缩小政府的活动范围，能够比较有效地实现资源合理配置；莱茵模式则是一种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国家进行适当调节，辅以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市场经济，能够比较有效地实现社会公平。长期以来，美英模式和莱茵模式不仅是资本主义体系内相互竞争的两种典型模式，也是许多国家竞相效法的两种资本主义“榜样模式”。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初，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美英模式和莱茵模式更是受到了普遍关注。1950年—1973年，美国实际GDP增长率为3.6%，人均实际GDP从9573美元增加到16607美元，增长超过72%；德国实际GDP增长了6.3%，人均实际GDP从4281美元增加到13152美元，增长超过200%。然而，1974年—1975年爆发了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美国经济更是进入了衰退时期，美英模式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挑战。与美国相比，德国经济则处于相对稳定增长之中，莱茵模式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与膜拜。从1973年—1983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为1.1%，而德国则为2.1%；1980年，德国人均实际GDP为13217美元，高于美国的11787美元。面对滞胀困境和各种挑战，美英等国放弃了长期奉行的凯恩斯主义，转而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开始了美英模式的新一轮“镀金岁月”，并于20世纪90年代“战胜”了莱茵模式。美国经济从1992年开始1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3.5%，1995年—2001年间更是占据世界GDP增长的96%，实现了世界经济史上最极端的不平衡的发展。与此同时，莱茵模式各国经济却不同程度地遇到了严重问题。1995年—2000年间德国平均GDP增长率仅为1.4%，平均失业率则高达10.4%<sup>①</sup>。然而，正当世界各国对自由放任式的美英模式大加追捧之时，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却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急剧下降，步入了以9·11事件开场、以金融和经济危机结束的“地狱十年”<sup>②</sup>。与美国一样，德国等莱茵模式国家也步履蹒跚地迎来了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危机之下，美英等国被迫采取了凯恩斯主义式的干预政策，只能步入新一轮政府干预式与自由放任式的美英模式的交替往复和金融经济危机的周期循环；由于欧洲各国社民党的溃败和“缓慢瓦解”，莱茵模式更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或许，西方资本主义“必须在古典、凯恩斯、撒切尔-里根模式的基础之上创建第四种模式，以适应21世纪的需要”<sup>③</sup>。否则，西方资本主义必将遭遇更加彻底的失败。

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危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sup>④</sup>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资本主义愈是发展，其发展方式的危机便愈加严重。在自由竞争时代，西方资本主义依靠剥削劳动、殖民战争和殖民贸易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张。进入垄断阶段之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步形成，西方资本主义通过资本输出、技术垄断以及各类战争，更加巧妙而残酷地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财富。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深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它们所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和游戏规则，继续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持续地剥削和掠夺广大发展中国家，以试图缓解日趋严重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资本积累危机。然而，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必然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陷入经济停滞甚至衰退并造成世界市场的萎缩。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的研究显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西方富裕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全甩开了其他国家，西方资本主义作为“富人俱乐部”的地位得到了不断强化，不发达国家发展的可能性则日益被侵蚀。1820年，最富和最穷国家

① 参阅徐崇温：《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第158、174、182页。

② 安迪·瑟沃：《终于再见了，“地狱里的十年”》，[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12月7日。

③ 阿纳托尔·卡莱斯基：《我们需要建立新的资本主义模式来与中国抗衡》，[英国]《泰晤士报》网站2010年2月4日。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29页。

的人均 GDP 之比为 3:1, 1992 年则上升到 72:1<sup>①</sup>。这样, 西方资本主义依赖“外在于它自身”的东西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可能空间日益狭窄<sup>②</sup>, 大量过剩资本不断转向投机性金融领域,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和虚拟化程度不断提高, 日益步入不可持续的严重依赖金融泡沫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同时,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还导致了全球范围日益严重的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资本的血腥和肮脏不仅在于压榨劳动, 也在于掠夺自然。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破坏性基因, 也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动能。然而, 世界能源和粮食价格的持续上涨以及“自由物品”的日渐稀少表明, 资本主义依靠“劳德代尔悖论”式的发展, 也就是依靠摧毁社会财富(使用价值)扩大私人财富(交换价值), 把昔日丰富的东西变得日渐稀缺以满足资本的贪婪逐利, 已经失去了进一步扩张的空间。因此, 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必然导致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余地达到极限, 使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扩展达到极限。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危机的必然结果, 也必将导致资本主义发展方式乃至生存方式的更加严重的危机。

### 3. 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将导致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历史经验表明, 资本主义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必然导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此次危机也必然给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而持续的影响, 导致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大调整、大动荡时期, 世界格局和发展进程也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和转折。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统治开始动摇。长期以来,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霸权统治主要依赖于意识形态霸权、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以及庞大的军事机器等。作为一种最重要的“软性”制度安排, 意识形态的影响弥漫在几乎所有的其他制度安排之中。因此, 尽管意识形态的演变往往是渐进而缓慢的, 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必将极力捍卫其全球“意识形态霸权”, 但是, 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导致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危机与瓦解却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它必将严重动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球霸权统治的制度基础。同时, 以美元为中心的不合理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更是受到了愈益严重的挑战。2007 年, 拉美共同市场协议国家和美洲玻利瓦尔替代发展计划(ALA)国家创建了南方银行, 构成了对美国主宰的、新自由主义的美洲国际银行的有力挑战, 一些成员国还退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在拉美地区创立一种共同货币以替代美元的进程也在不断推进之中。可以预期, 随着世界范围内区域性金融合作组织和货币体系愈益增多, 作为西方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和掠夺的重要工具, 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危机将不断加重, 从而严重动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霸权统治。此外, 尽管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依然拥有较为强大的军事机器, 但是,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表明, 美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或者“一场半战争”的理论与计划已经破产, 美国及其盟友的综合实力和全球控制能力已经显著下降。总之,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霸权统治已经处于前所未有的衰落之中。其未来的发展, 或许正如“中美国”论创始人弗格森所言: 像美国这样的帝国与所有复杂体系一样, 在一段长度未知的时段里看似运行平稳, 然后却在刹那间毁灭<sup>③</sup>。

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影响日渐提升。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趋势逐步显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 1991 年—1998 年, 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为 2.5%, 发展中经济体为 3.3%; 1999 年—2006 年, 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为 2.7%, 发展中经济体为 5.8%。尽管此次危机也严重冲击了新兴国家, 但是, 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国家崛起的势头并未减弱, 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格局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 南方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以高于

①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 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3期。

② Davi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41

③ 尼尔·弗格森:《美国, 脆弱的帝国》, [美国]《洛杉矶时报》2010年3月1日。



北方国家经济增速向前发展的态势也没有改变，其发展前景依然乐观可期。2006年，由普华永道所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到2050年中国经济将与美国并驾齐驱，而印度将成为第三大经济体。一年之后，高盛公司研究者预言，中国将在2027年之前超过美国，而印度将在2050年之前超过美国，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和俄罗斯的经济产出之和在2040年将超过目前的7国集团。经济实力的变化必然带来政治格局的调整。20国集团替代8国集团作为全球治理机制的出现和功能的不断提升，标志着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步入世界事务的中心舞台，西方发达国家独自为世界“定调”的时代必将过去。可以预期，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将与19世纪末德国、俄国和日本的兴起一样意义非凡”，本世纪中期将会出现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sup>①</sup>。

世界历史步入动荡多变时期。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球霸权统治的衰落和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全球多极化的趋势难以逆转，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民族国家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将更加复杂，世界历史由此将步入更加动荡多变的复杂时期。全球“意识形态霸权”的真空必然导致各种意识形态的激烈竞争。伴随着文化、宗教和价值观的冲突加剧，地区主义和恐怖主义等各种影响全球稳定的思潮将会不断扩散、升温。随着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金融体系的危机和各国在全球金融货币领域主导权的竞争加剧，必然导致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因素的增多；同时，尽管此次危机对西方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有所遏制，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分离已经呈现出难以逆转的态势，金融垄断资本的再度扩张和虚拟经济的畸形膨胀也将重新加大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直接威胁到世界经济运行的稳定。随着WTO利益主体多元化趋势的增强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未来多边贸易体系将形成更加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不同的谈判议题会催生各种形式的利益联盟，超经济的谈判手段将不断向贸易谈判渗透，多边贸易体制的运行面临严重冲击；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的广泛滥用，也势必进一步加剧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摩擦<sup>②</sup>。此外，随着全球经济战略制高点竞争的加剧，全球贸易规则的博弈也将会更加复杂，市场和资源的争夺将会更加激烈。更为严重的是，面对全球新兴力量的兴起和国际竞争的加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绝对不会将其霸权地位拱手相让。尽管此次危机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面危机，但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总危机。目前，高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和调整能力固然错误，低估他们的实力和调整能力同样错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拥有最为强大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以及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为了维持其霸权地位，除了试图通过征收碳关税等手段以逼迫新兴经济体在高油价、高汇率、高关税等多重压力之下永远处于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发动霸权战争以消除导致问题的根源，对于美欧等国无疑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或许，在更加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构建完成之前，人类不得不经历一个痛苦的动荡多变的复杂时期。

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时代。从目前来看，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正在印证这一伟大预言。（待续）

（编辑：张 桥）

① 威廉·塔布：《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面临四大危机》，[美]《每月评论》2009年1月号。

② 杨丹辉：《世界经济发展的十大趋势及其影响》，《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1月17日。



# ABSTRACTS

## **Western Countries'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es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Wang Weiguang, Cheng Enfu & Hu Leming etc.

Capitalist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s have to lead to the present western countries'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es, which also show the concrete contradictions on capitalist microcosmic bases, economic structures and regulations, and another aspect. Western countries' countermeasures on the crises play some roles on resuming markets confidence and stabilizing the economy, but those did not eliminate the capitalist fundamental and concrete contradictions which lead to the present crises, and would be gradually coming clear with the deficiencies and negatives in the future. Western countries' financial markets and economic tendencies are not clear and complex. China should surely insist on going the great road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avoid and defend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es.

## **A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Theory of Business Cycle**

Zhu Kui

Marx expounded the capitalist business cycle from the angles of insufficient consumption, disproportion and digressive profit rate, which was based on the capitalist basic illogicality. However, there are not only institutional factors but also non-institutional ones among the factors leading to the capitalist business cycle. Market economy, socialist economy and capitalist economy are of respective causes bringing on business cycle. The business cycle by reason of the opposi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is the inherent business cycle of capitalism.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its coming into being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give a modern interpretation to Marx's theory of business cycle.

## **Capital Logic and Spatialization Order: The Analysis of Neo-Marxism Space Theory**

Zhang Fengchao

The Neo-Marxism scholars studying on the city theory push forwar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pace theory by taking "space" as the fundamental factor. In their views, the spatialization complies with capital logic, and implies a spatialization order: from space forming, space difference, space process to space effect. Space is not only the outcome, which is in control of and yields to capital logic, but also the re-producer of capitalistic relationship; uneven development state of space is not only the result but also the precondition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 spatialization of capital is droved by both the spati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flexible accumulation in the experience of time-space compression; the spatial renovating path is the